

# Future City

# 未来 城市

[荷兰] 斯蒂芬·里德  
[德国] 约尔根·罗斯曼 编著  
[荷兰] 约伯·范埃尔迪约克

曹康 张艳 朱金 陈宇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本书的翻译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308491）、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13YJC770002）、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2013010111002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课题”（13ZJQN018YB）、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浙大建工－东联设计·城市与环境规划建设创研中心项目资助。

# Future City

# 未来 城市

[荷兰] 斯蒂芬·里德  
[德国] 约尔根·罗斯曼 编著  
[荷兰] 约伯·范埃尔迪约克

曹康 张艳 朱金 陈宇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1-126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来城市/(荷)里德,(德)罗斯曼,(荷)范埃尔迪约克编著;曹康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112-18280-0

I. ①未… II. ①里…②罗…③范…④曹… III. ①城市—交集 IV. ①TU-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61925号

Future City/Stephen Read, Jürgen Rosemann, Job van Eldijk, ISBN-13 978-0415284516

Copyright © 2005 Stephen Read, Jürgen Rosemann, Job van Eldijk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英国 Taylor & Francis Group 出版公司授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责任编辑:董苏华 黄 翊 施佳明 焦 扬

责任校对:张 颖 姜小莲

## 未来城市

[荷兰]斯蒂芬·里德 [德国]约尔根·罗斯曼 [荷兰]约伯·范埃尔迪约克 编著  
曹康 张艳 朱金 陈宇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76千字

2016年4月第一版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58.00元

ISBN 978-7-112-18280-0

(2745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                   |                 |     |
|-------------------|-----------------|-----|
| 引言                | 约尔根·罗斯曼         | 1   |
| 未来的形态             | 斯蒂芬·里德          | 3   |
| 从兰斯塔德到三角洲大都市      | 德克·弗里林          | 19  |
| 重塑约翰内斯堡           | 琳赛·布雷姆纳         | 33  |
| 悉尼国际形象的打造         | 佩内洛普·迪安         | 49  |
| 吉隆坡：寓言式后大都市       | 拉梅什·库马尔·比斯瓦斯    | 61  |
| 孟买：千年的身份          | 吉姆·马塞洛斯         | 75  |
| 资本主义与城市           | 理查德·森尼特         | 90  |
| 退离“后”             |                 |     |
| ——“全球本土化”城市现代性的生成 | 埃里克·斯温格多夫       | 101 |
| 在全球化数字时代阅读城市：     |                 |     |
| 在地貌表征与空间化的权力工程之间  | 萨斯基娅·萨森         | 121 |
| 与信息嬉戏：21 世纪的城市主义  | M·克里斯汀·博耶       | 132 |
| 洛杉矶：集群城市          | 卡济斯·瓦内利斯        | 151 |
| 阿姆斯特丹：超越内外        | 斯蒂芬·里德          | 171 |
| 对杜阿拉的本地导航         | 阿布杜—马里克·西蒙      | 189 |
| 贝尔格莱德：城市丛林中的进化    | STEALTH 小组      | 205 |
| 香港：体验之城           | 盖里·常            | 219 |
| 大都市印象 1           | NEXT Architects | 233 |
| 大都市印象 2           | NEXT Architects | 241 |
| 附录资料              |                 | 246 |
| 后记：译余废墨           |                 | 250 |

# 引言

约尔根·罗斯曼

这是一本关于城市——未来主流人类定居点形态——的书，内容是关于城市正在进行的转型，以及城市的塑造——利用规划和设计来影响甚至决定城市未来的能力。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类似今天这样的城市化历程，城市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膨胀过。短短几十年的城市化，已经导致空前规模的人口集聚。1950年，有着1200万人口的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今天，像墨西哥城、圣保罗、东京和孟买这样拥有超过2000万居民的大都市早已在人口数量上远远超越了纽约。

大部分新的超级集聚现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往往伴随根本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革；贫困的农民想在快速发展的城市经济中寻找新的谋生方式，越来越多的难民在设法逃离世界范围内逐步升温的矛盾冲突。结果，新的巨型城市不得不面临主要由贫穷的、未受教育的农村移民组成的前所未有的洪流，从而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状况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而在发达国家，乍看上去城市面对的是相反的问题。城市不是在增长，而是人口向郊区流失并呈现弥散式的扩张。尤其是高收入人群正在离开核心城市，居住到那些保安措施更好、通常设有大门的郊区社区当中。与此同时，城市蔓延已经延伸到大都市地区中。边缘城市和网络城市正在拓展传统城市的边界，创造出新的城市实体和新的城市生活维度。

因此，城市化过程不仅导致新的城市维度的出现，维度的形式和结构也经历着巨大的改变。工业生产自动化与数字化方面的创新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大规模采用，正改变着企业和就业的区位条件。新的交通运输系统扩大了城市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产生新的中心化形态。全球化与国际化使城市集聚体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同时，城市还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社会形态对比。不过，在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同样也带有碎片化和分离化的特征。

基于这一主题，《未来城市》格外关注如何将城市化内在的动态过程进行抽象化。斯蒂芬·里德（Stephen Read）在接下来一章中详述了这一主题，批判了很多规划与设计思想中带有的形式化乌托邦主义，建议尽

可能去概括一种过程化的城市乌托邦主义。这种主张明确地肯定变化乃基本状态和方式，用森内特的话来说，为“……史实、意外、矛盾和未知预先制定对策”。理解了权力与控制的结合在这种过程中如何清晰体现、理解了它们的产物，这对于理解人类创造性如何重获优先权十分关键，它是赋权的基础，是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源泉。

这种对当今城市状况的概念化和经历的重视也反映在本书的形式和结构上。本书由三部分构成：10篇城市案例研究，从高度规划的（荷兰斯塔德三角都市群）到高度自发的（贝尔格莱德）都有；几篇理论性文章，讨论当代城市社会和城市化的基本概念；一篇由“下一代建筑师”（NEXT Architects）所作的图像性文章。

这三部分相互松散地组织在一起，文章相互之间的启示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则是出于偶然。我们将这些文章并置在一起，希望能让读者反复考虑他们如何看待和思考身边这个构成日常生活框架的城市环境。

# 未来的形态

斯蒂芬·里德

为这样的书作导言，最开始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对当今世界的城市化率作一个统计。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最终结果：我们明显已经——虽然没有说出确切的时间点，但大家都嚷嚷着这一即将到来的时刻——超过了 50% 这一点。从此刻起，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毫不含糊地是一个城市化的世界了。考虑到这一过程进行的速度——有各种关于到 2010 年、2025 年和 2050 年我们的状况的预测——无论如何，到 21 世纪末，我们生活的世界毋庸置疑将与我们从人类发展到现在的历史中所了解的世界截然不同。而所有这一切发生在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当中。

众所周知，城市未来预测是片棘手的领域，其中散布着过去某些尝试的残骸。这些尝试现在看来既陈腐、肤浅又忽略了某些迹象，它们在日后看来简直是明摆在预测者面前。然而我们似乎必须标记这些灾难性的城市冒险当中的某些时刻并对冒险活动最终的导向进行预测。当然，这不仅因为城市冒险绝对不是脱离我们控制的云霄飞车。我们有能力影响城市的故事如何继续进行，我们也必须对之进行理论化。这样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才能承担引导这个故事的责任。我们希望城市的故事在方向上不仅是平等的，即在巨大且包罗万象的城市网络中，对生存以及自我实现的机遇进行分配和协调时的平等；而且也是可行的、解放的，对人文精神是支持的。这些被标记的时刻近日来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至于我们觉得应该能够进行深入思索和思想上的遨游了——这种遨游几乎肯定会在充满礁石的海滩上触礁，礁石虽然明显，但（对我们而言）尚未被察觉。因为，考虑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变化的范围和动力；考虑到再次眨眼间必将发生的变化的深远程度，不在此刻进行比较激进的思索——即使思索的不是未来的确切形式，至少也是该形式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如何去影响它——的话，也显得很是不合时宜。

变化发生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当然，某些变化十分明显而实在，某些却很难解释。许多变化是地方上的、特定的，有可能使更为一般而根本的趋向显得模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此时是大量人流从农村地区向城市中

心转移，而工业化发达地区在不久以前还因富人们涌向郊区而造成城市中心的空洞化。这些郊区在城市化，这里处处发生着让生活更加城市化的变化，它们扎根于正规或非正规的城市经济之中。从技术层面上对现代生活质量进行改变大有可为，这些技术包括私人与公共交通、电话通信、网络与传媒。在世界上不少地区甚至是大多数地方，它们已经无所不在了。瞬时的量子跃迁般的巨大突破——在全球化进程极为依赖的时空压缩之中——伴随着电话、高速旅行，然后是互联网和其他空间化程度更高的技术性网络而来。这些美好的展望到 21 世纪都将黯然失色，届时网络将更为密集地相互重叠，集成度更高，最终恐怕会变成全球“技术皮肤”<sup>1)</sup>。除了无所不在的连接之外，它使得对经济、环境和城市进程的实时监控和反馈成为可能。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转移焦点的可能性——确实也是必要性——就是在发展技术时不是去关注如何征服我们的世界或压榨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是去关注如何理解并管理世界的发展过程。

但尽管技术可能性和对连接的需求呈爆炸性增长，由于地球资源的供给趋向社会极化和不公，供给压力似乎一定会上升。在过去 20 年里，世界年均产值从 40 万亿上涨至 230 万亿美元，而与此同时世界贫困人口也增加了 20%。由于世界产值的增长伴随着就业率的下降，占世界人口 20% 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也下降了，从 1960 年的 2.3% 下降到了 1997 年的 1.1%。<sup>2)</sup> 马克思经济学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经典对立，被参与主要经济运行（以及增加的财富）的人，与被该循环排除在外、必须靠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在非正规部门和临时工作中谋生的人之间的对立所取代。不断加剧的社会极化现象出现在不同尺度的层面上：在城市里，可达性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地方网络的加速将地域分割为受保护的特权区域和被排斥的禁区；在区域中，穷人逐渐陷入内城地区，而富人和更有行动能力的人占据了城郊地区；在区域之间，全球经济运行中的区域竞争一直进行着；在全球尺度上，大片区域逐渐被排除在全球经济网络之外，而其他空间实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支配和控制了这些网络的运行。

在提出必须在自身层面上加以解决的问题的同时，按照对整体的理解，发生在上述各个层面上的变化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某些问题从其他问题当中衍生出来，城市理论化这个问题也变成了一个了解、计划一连串变化的问题，变化的后果及其副产物也在计划之中，它们驱动着城市机器。而隐含在我们如何理解这一事物的机制中的，是某种选择或判断。尽管对“总体性话语”持保留态度，如果我们仍想实现某个危机管理目标，我们就必

<sup>1)</sup> 由德里克·德凯尔克霍弗 (Derrick de Kerckhove) 在他的论文《建筑与等离子体》(Architecture and plasma) 中提出，《Archis》，2002 年第 5 期。

<sup>2)</sup> 《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纽约：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1997 年。

须根据自身生存环境去理解它。我们需要以理解进步的方式去理解它，这种进步是朝向固定价值承载目标的。这个层面上的定义和方向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它们有先后次序，在观点上带有强烈的政治和道德因素。我们必须分析那些半意识状态的、半检测状态的有关城市的假设及其后隐藏起来的价值观。存在着心理上的习惯以及对显而易见的事物的假设，它们使我们所处的困境更为艰难。

我们尤其需要摆脱某些习惯，它们会使城市成为带着控制社会进程的目的而被操纵的东西。规划方法及其乌托邦色彩浓郁的前身总是设定出一个固定的空间秩序来巩固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稳定态。在空间形态和规律而机械的社会进程之间，这些方法构思出一个理想的一致性，并把这种形态、这种固定的未来加诸往往是乏味而压抑的乌托邦式讽刺画上。我们需要的——而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是一个理解城市的框架，从而摆脱关于城市及其产物的乌托邦式的微妙概念造成的束缚、超越经验法则的部分与整体，我们如此熟悉这些概念以至于觉得它们是很自然的。需要的是明确围绕城市变化原则而建构的框架，知道如何去影响它。这个框架确实可以把对历史中的进程、发展和变化的认可纳入进来，框架也反映在不断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形成和转型的进程当中。

这个世界的城市化过程内涵丰富，远不止意味着更多的房屋，更多的地表被覆盖以沥青，可供漫步的绿地和树林更少，尽管很明显这些现象表面上说明了城市状态过度了会怎样。作为个人以及作为我们称之为“社会”的这个意义模糊的棘手事物的一分子，我们必须与我们生命的深层结构相关。因为，虽然我们从各方面都在变得愈加个人化，与家庭、邻里、社区、国家等的联系愈来愈少，但同时我们却比以往还要陷入在这个世界里，它由我们与其他人类，以及我们和这些人组成的机构之间的各种媒介关系构成。在密密麻麻的相互连接的关联性网络里，真正孤立的时刻越来越少了；我们的生活愈发取决于我们置身其中的超高速连接的世界以及人、地方与机构之间不断增加的相互关联——当我们的意识不断远离真实的社会参与和归属时，情况更是如此。当蚂蚁的世界因其他蚂蚁的存在而形成时，蚂蚁的几种行为通过某些我们尚无法解释的过程变得社会化。我们在不断深入到这一社会相互连接和主体间性<sup>3)</sup>的领域内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什么。

潜在的可能的惊喜并非仅仅来自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和相关作用的开放性——这些作用既能把社会纳入不断扩张的同质化容器，也能保持强有力的相互联系和跨越不同尺度的效应。这些不稳定的影响本身能够帮助制度结构

<sup>3)</sup> Intersubjectivity，又译“相互主观性”、“共识主观”等。由拉康提出的一个概念，研究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译者注

稳固下来,同时也可能包含相互制衡,包含虚拟空间里的吸引子,它们能够将整体维持为某种可识别的、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不过,若是考虑到技术网络对我们的体验的中介作用不断增强,其他可能产生的作用则包括身体自身感知能力的退化。因为在连续的身体运动中,感知力是对体验的自我参照过程的一种“创造性补充”,那么“可进行反馈的交叉参照的外部条件越贫瘠,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创造性补充就越活跃”。<sup>4)</sup>

社会与城市似乎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密切相关、无法分割,恐怕注定最终要向彼此袒露各自的固有本质。正如西美尔指出的:

这样的生活是无形的,但它自身却不断生成形态……尽管这些形态产生于生活之中,但由于它们特有的群集方式,它们并没有跟随生活那躁动不安的节奏……它们取得了固定特征,这是它们自身的逻辑和合法性;这一新的刚性必然使它们远离创造了它们并使它们独立的精神动力。<sup>5)</sup>

我们描述为一致性和“物质性”的那些事物,除了它们自身以外一无所有。这些事物的一致性与自主性中隐藏着无序的涌现,而且经常极端复杂,一致性仅仅呈现在这一过程的表面。这一思想被怀特海德通过“永久性”——从有限领域内的流动、过程和关系中建立的“实际上无坚不摧的物体”<sup>6)</sup>——这一概念而规范化了。对复杂系统的数学研究揭示了类似的逻辑<sup>7)</sup>,推翻了牛顿的确定性机械式宇宙观。勒·柯布西耶的和田园城市运动的机械式城市至少就其纯粹意义上而言也不过殊途同归。我们现在知道,事物、实体和现象涌现的方式几乎和一条湍急的河流中的驻波一样;它们表面上的稳定性隐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是从动态关系中出现的。在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网中过程与事物捆绑在一起,我们归因于稳定性的那些事物只是暂时性的“永久”,当生成并维持它们的条件、力量和流动改变时,它们很容易受到压力并产生变化。我们就生活在变化中,许多变化初看起来令人吃惊且无法理解,但在变革的关键性时刻过去很久之后,这些变化或许最终都会揭示其涌现的逻辑。我们在面对这些发生在周围的变化时显得很焦虑,这显示出要经受这一变化过程有多么困难。我们的归属感与居住在一个自己能够理解的世界里有关——而且在这里我们还要能被他人理解。<sup>8)</sup>在这个世界里,对于一代年轻人而言,坚固而确定的东西在他们步入中年前就有化为泡影的趋势,这种对世界的熟悉感确实将变成

<sup>4)</sup> B·马苏米(Massumi),《虚拟的语言》(*Parables for the Virtual*),达勒姆:公爵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sup>5)</sup> G·西美尔,《现代文化中的矛盾》,选自K.P.艾兹科恩(Etzkorn)(编纂并翻译),《乔治·西美尔:现代文化的矛盾及其他论文》(*Georg Simmel: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纽约:教师学院出版社(Teachers College Press),1968年:第11~22页。

<sup>6)</sup> A·N·怀特海德(Whitehead),《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罗威尔(Lowell)讲座,剑桥大学出版社,1926年。

<sup>7)</sup> J·科恩(Cohen)与I·斯图尔特,《混沌的崩溃:在复杂世界中发现简单》(*The Collapse of Chaos: Discovering Simplicity in a Complex World*),伦敦:维京/企鹅出版社(Viking/Penguin),1994年。

<sup>8)</sup> 参见M·叶礼庭(Ignatieff),《没有哪里像家:归属感的政治学》(*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选自S·杜南(Dunant)与R·波特(Porter),《焦虑的时代》(*The Age of Anxiety*),伦敦:维拉戈出版社(Virago),1996年。

一种罕见的状态，在暂时性变为常规时，我们肯定需要去学习怎样应对我们的城市未来。明确意识到需要在心理和文化上接受暂时性是一种存在的常态，这可能是在创建未来时最困难但也是必需的任务之一。会导致偏狭以及社会的、地域的隔离和极化的恐惧，并不能给这一未来的形成以力量。

实际上，大部分我们设计出来并用于营建城市的战略，其根本动因是避免或是控制这一形成和转化的内在逻辑。简·雅各布斯曾权威性地提出过，规划手册里的邻里小区和市中心通常是那些希望远离急躁不安和无法控制的区域——远离城市本身那受到污染的力量。在20世纪的大规模建设潮中，这些区域变为一种常态，比起雅各布斯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街道和人行道来说，更能为城市新一代居民所理解。在现代的室内化了的购物环境和被隔离的郊区或设有门禁的“社区”中，这些区域实现了自己的最高形式——作为一种通用的插入元素在城市中心和边缘都能找到。

不过这些区域决意要界定一个安全而可预设的内部空间，就像强调要界定一个外部空间一样；这个空间超越了对高度地方化的空间与社会设计的考虑，在我们营建当代城市时，这个空间已经成为当代城市的另一个典型环境。中心的边缘区那有着“破烂不堪的纹身店和旧货店的不协调的边界”<sup>9)</sup>，还有外围地区那些奇怪的、荒芜的、无法命名的空间，是如今以通属方式营建城市时有意形成的。自相矛盾的是——如果考虑到许多20世纪的规划乌托邦那直截了当的反城市主义的话，或许也不那么矛盾——目前，正是这些空间向我们呐喊着某种城市环境出现的可能性，这种环境面向变化的状态，面向权宜的和实际的占用，也面向未经计划和不可预测的活力。正是这些空间吸引了城市研究与设计领域中某些最有原创性的头脑的注意力<sup>10)</sup>；正是这些空间似乎常常在信守对未来的承诺，这个未来面向新的出人意料的可能性，也面向人类的需求可通过强化人类的创造力和智谋来实现这一点。这些空间超越了制度化了的消费的约束限制和僵化的社会模式，或许能向某些个人和团体提供他们在寻找的机遇。仍然是雅各布斯向我们指出：“有一种性质比彻底的丑陋与无序还要卑劣……虚假秩序戴着不实的面具，它通过忽略或压制在奋力生存的真实秩序来实现。”<sup>11)</sup> 因为受保护的、经过规划设计的城市空间与那些未经设计的空间相对立，后者实际上因其未经设计因而提供了被创造性占据的可能。所以在企业经济和消费的快速全球化秩序下，大量躁动不安的个人精神反对对计划的生活进行严格控制，这些精神存在于各种规模的边缘区域内（从郊区或贫民区到第三世界），它们或者不得已要为了在这种排外的秩序之外生存而奋斗，或者仅仅是为了有创造能力

<sup>9)</sup> J·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65年，第35页。（中译本：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sup>10)</sup> 例如，S·博埃里（Boeri），“研究计划备忘录”（Notes for a research program），见《突变》（Mutations），巴塞罗那：arc en rêve centre d'architecture & ACTAR，2000年。

<sup>11)</sup> J·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65年，第25页。

并实现自我。

我试图从所有这些事实当中得到——除了城市内部和自身都可以分裂，除了我们以及我们的建造方式都可以让城市分裂的事实外——一个相当幼稚的结论，即如果允许城市发展过程自由地进行表达或运行，过程本身对人类的机遇和自我实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赌局。这个论点曾同时在过去的政治左派与右派中以各种形态出现过，论点持有者是反对现代主义规划的乌托邦式恒定性的人。“看不见的手”是我们都极为熟悉的概念，我们需要避免直截了当地重复利用那些关于变革动态的思维定式，并把它们投射到城市上。如果我们是诚实的、勤奋的，无论我们从哪里开始思考城市发展过程，我们都肯定会面对异质性，它不仅会出现在过程的产物当中，也会出现在过程的自身本质当中。在前文提到的相互依赖的过程与事物的关系网中，过程与事物的特定配置会积极地重新生成这些配置关系以服务自身的利益。城市世界既是一个相互竞争的强权利益的生态体系，有能力自上而下地操控整个领域；也是一个协同的能动者的生态体系，它自下而上地使结构逐步形成。

将社会和经济过程与流动的渠道分成“树型”或“半网格型”（如果听说过克里斯·亚历山大）<sup>12)</sup>，或“等级”与“网络”（如果听说过曼纽尔·德兰达）<sup>13)</sup>，或“树”和“根茎”，或“条纹的”和“平滑的”空间（如果听说过德勒兹与瓜塔里）<sup>14)</sup>——尤其是如果我们认识到网络系统可以在不同规模等级上以不同的模式操作，也可以在跨规模等级的不同层次的整合与相互作用上进行操作——就能够提供一种方法，帮助理解我们如何影响并指导城市化与社会形态过程，直至最终得到解放的、可实现的结果。众所周知，这取决于网络是树型的还是半格型的，而它们具有截然不同的分布控制方法。但这里需要再次提出警告，即在真实世界中，网状结构/半格总是与等级/树型结合在一起，或以两者的混合形态出现，它们的性质，即使是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下也几乎不可能仅受一种理论决定。事实是，如果我们既想获得解放又想被理解，那么我们两种形态都需要。就像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虽然更专制，但根茎也有自己的等级体系……针对根茎有内在和渠道化的专制形式，就像它们在超然的树的体系中是无政府的变形一样。”<sup>15)</sup> 德兰达警告说“网状结构通过漂移而生长，而且它们可能会漂到我们不想去的地方。等级体系的目标导向是我们至少希望为某些制度而保留的一种性质。”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改变，从“城市体现着某一社会生活状况”这样

<sup>12)</sup> 参见 C·亚历山大，“城市并非树型”（A city is not a tree），选自 G·贝尔与 J·蒂里特（Tyrwhitt），《城市环境中的人的身份》（*Human Ident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72 年。

<sup>13)</sup> 参见 M·德兰达，《网络，等级与界面》（*Meshworks, Hierarchies and Interfaces*），网址：<http://www.t0.or.at/delanda/meshwork.htm>。

<sup>14)</sup> 参见 G·德勒兹与 F·瓜塔里，《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 年。（中译本：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年。——译者注）

<sup>15)</sup> G·德勒兹与 F·瓜塔里，《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0 页。

一个世界变为“体现着这一社会生活状况”。生活时空的浓缩既包括乡村也包括家，而城市就是这种时空浓缩的间隙。这两种非城市的状况都已经逐渐被渗透，至少对我们某些人来说，几乎所有被认为是属于城市的活动和功能，都可以而且也正在到处进行着。我们面对计算机屏幕或通过电话在家中购物和工作。我们开车前往城外的商业园区和购物中心，将文件和笔记本电脑或是购物袋拖回车内，车就停在不久前还曾放牧牛的地方。但同时，因为城市正在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状态，城市场所的性质呈现出各种混杂的、新型的形态。城市之间与城市内部那明显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通过本地状态这样的形式出现，需要暂时考虑全球化过程下不协调的本地特征。在许多情况下，强烈的本地场所条件的消失可以和同时出现的一些场所形成对照，这些场所所具有的力量恰恰是其与全球化网络联合的结果。<sup>16)</sup>就当今的设计者和规划师而言，他们得到的经验是对问题的一种理解——不那么肤浅，不那么形象化，或许不那么以目标为中心并且肯定更加以过程为中心，是对城市和城市场所的状况的理解。虽然全球对本地的影响会形成另外一种对本地状态的理解，但本地和全球并不是现代城市仅有的两个规模尺度，当然也不是仅有的承载特定城市条件的规模尺度。

在我们的世界，很少有场所——城市场所更是如此——没有接触过全球，不过全球和其他规模尺度的影响尤其取决于它们的特定传输渠道。虽然在我们当今的世界里，这些渠道并不需要都是物质网络，我们的特定任务之一就是根据城市规模的相互关系及调和它们的网络来理解城市的构成。就像布鲁诺·拉图曾经提醒过我们的，技术网络的延伸已经造成了庞大的规模效应，使本地、全球和所有规模尺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得以形成。然而，我们不应当根据普遍与偶然这种旧的对立范畴来错误地思考本地和全球。我们可以遵循所有网络的路径，无论这些网络的规模如何；所有的网络都是在本地被制造、使用、监控、调整、控制和维持的，是为那些在本地找到位置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既然今天有“……从地方到全球，从具体到一般，从偶然到必须的连续路径……”，这些路径“……只有在支线的费用被支付时”才会被保留并一直保留下去。<sup>17)</sup>这样考虑的话，不难看出对我们而言，当代城市的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并不怎么围绕本地的毗邻性问题，而普遍的全球性传播到所有本地层面这一事实对该问题进行了补充；它们所围绕的是巢状规模等级中的对角线路径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本地状况的路径通过城市—社会空间交织在一起，这些空间跨越了在相邻或不那么

<sup>16)</sup> S·撒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

<sup>17)</sup> B·拉图，《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剑桥(马萨诸塞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

相邻的城市规模之内或之间进行运作的网络，同时也被这些网络改造。若是简单地认为本地性是给定的，受其在笛卡尔空间中的坐标定义，这样思考已经不够了——同样，视规模问题将一般全球性简单渗透到所有生活和所有地方，这样思考也已经不够了。更确切地说，应当把本地视为真实的社会和经济相互连接的产物，在城市那物质的、虚拟的网络空间当中，人和人之间的交易以各种速度和规模（直至包括全球性规模）追踪这些连接。

这种观点如果认真对待的话，我们感觉一定会让我们超越规划师和设计师关于“社区”、“邻里”、“城市乡村”等的传统观念，它视本地为一种避难所，是心怀不满的现代都市人的心理家园，是为了抵御城市的污染和干扰效应而修建的某种防护性缓冲区或堡垒。我们感觉，支持赋权于民——尤其是那些在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下力量有限的人——这一做法，基本上一定会在那些过程中找到价值所在——就是那些趋于“全球化”（或至少“去地方化”）的过程，趋于从外部更广阔的世界向人们提供机遇和力量的过程。人们需要参与到改变当中去，需要通过在非本地的空间之中并且受其驱动的那些场所（这些场所既是虚拟的也是物质的，尽管我们觉得面对面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不应当被低估）进行参与。这种非本地的空间是开放的，与城市、区域和全球力量相连接，同时不受这些力量控制。如果这样才能变得像雅各布斯倡议的那种城市空间，那么我们需要寻找的就是维护雅各布斯的传统城市优点的方式，那是一种在相当不同的城市状态下的开放的、互连的、分为很多层级的稠密城市。只有在理解了今日人们的生活和谋生过程是如何将本地和全球，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所有其他规模尺度相连的，我们才能做到这些。

所有这一切包括很难预测的过程和机制，利用现有的关于城市的思想也很难将其概念化。它们本质上是一些过程，其结果取决于精准调试后确定的临界值，因此我们经常被置于一种熟悉的两难困境当中：在知道事物是否能够运作，如何运作以前就必须动手去做。在虚拟环境下对城市过程进行模拟，在真实世界中监控该过程，这是两条显而易见的前进之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做的，是不断思索我们看待和思考城市化、城市与社会形成过程、这些过程采用的网络、过程的抽象范畴的方式，这样我们才能开始深入探索所有这一切运作的方式——以及权力关系如何嵌入到有关城市停滞与变化的思想之中，还有这些思想如何在城市社会、经济领域传播开来。

这是一个研究计划的主题，我们此时此刻对其只能作一点指示。城市是

<sup>18)</sup> 布迪厄建立的一种实践理论,他认为行动是由关于在社会世界中如何运作的“实践感”控制的,惯习指我们在世界上感知、判断和行动时依据的倾向系统,包括两个核心要素——结构与性格倾向。——译者注

<sup>19)</sup> P·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78页。

<sup>20)</sup> P·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80页。

<sup>21)</sup> R·森内特,《利用无序》(*The Uses of Disorder*),纽约:诺顿出版社(Norton),1992年:第99页。

一种环境、一种生态,而不是一种社会实践的中立背景;它本身就是“惯习”<sup>18)</sup>的一部分,是“规范的即兴创作那已经运转良久的生成原则”,它所形成的习俗将会重新形成生成原则。<sup>19)</sup> 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不同的城市空间如何影响“不加指挥的编配,它将规则性、一致性和系统性”带给习俗。<sup>20)</sup>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机遇下,在非强制的情况下,通过赋予形态与模式的方式,如何施加影响让这一切发生,并且让未来处于持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作为试图建立能够赋权于民的生存环境的人,我们需要去理解人们的周边环境如何与其生活成为一体;在创造性适应的不断循环中,这些周边环境如何让人获得释放并自我实现,这也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为了这一目的而作的研究几乎还没开始,但是至少对我们而言,我们学科当中的盲点和被忽略的领域似乎都聚集在这个一般性地带周围。我们相信,从今往后对城市故事的描述将会更多地刻画城市如何应对变化因素并为之作出准备。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城市建设的程序,也需要关注我们对这一问题所要采用的概念工具。并且,我们不仅需要把这个工具与正义和公平的价值观进行较量,我们还需要将它与一系列价值观进行较量,这些价值观所包含的城市未来对“史实作好了准备”。<sup>21)</sup> 在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宣称已经有了答案,仅仅是围绕“作为城市永恒状态的转型”这一命题,而在此将问题提出来。

本书涉及的城市在探讨时从作者和该城市的特定条件出发来看待变化过程。我们不会宣称本书无所不包,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在这些故事之后有关于新城市的新故事。我们希望这些新故事能够展现在历史中的这一时刻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些侧面,并且全面考察在理解这些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概念认知。

## 所选论文

荷兰人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他们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共同努力向海洋争夺供生产和居住的土地,这不仅使他们有一个庞大的规划机构,而且使他们有一种习惯于规划思想的共同心态。荷兰这片景观是实实在在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也有明确的目标。这片景观不是一张白纸,不是等着被改写的平滑空间;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它进行测量、标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泛滥的随意占用土地现象在这里绝无可能。从最开始它就受对用途适用性进行规定的高度规范的制度框架所管辖。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种心理的同时也是物质的构造,土地也受到了变化的影响。思想的力量是变化的指导原则,这是德克·弗里林的文

章的主题。在此，城市化过程很明显是通过政策制定者和规划师的思想活动而构思出来的，该思想即各种规划部门为了一个改造城市景观的明确目的而最终协调起来。在这片大陆的其他地方，城市的改变似乎是在默认状态下进行的，首先是变为一片无形无状的蔓延，它围绕基础建设工程胶合起来成为一个城市化了的区域。在荷兰，因为在欧洲层面上维持竞争力是必需的，所以这一改变过程必须首先加以考虑。接下来，在国家政府、省和市的层面上将思想纳入到规划文件之前进行游说、摸索并达成共识，思想的指导得以进行。但是，即使是在荷兰，这一游戏规则的改变也有很长时间了。总体规划已经是博物馆里的文物，战略合作以及私营部门的合作才是如今的风尚。同样，与其说正规的规划评估或绿皮书是成就的罗列，不如说它是丢失的目标和不恰当的手段的罗列（通常是在概念化层面上，以及在理解改变生活模式同期待、同规划之间的关系层面上）。最主要的困难似乎是根据稠密的生存环境，将人们对城市品质和舒适性的期待转化为现实。交通规划在影响变化方面是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对该规划进行概念化或许就表现出上述困难。在更高规模层面上其有效性相当清楚，但在小规模层面上——在不同规模的网络的相互渗透与作用中，在那些影响到生存环境的特性和生存环境的社会结构中——理解仍停留在概念上，它忽略了区域层面与地方层面之间的社会与经济联系所具有的密集分层。

现代主义规划把城市看作可以进行合理化的东西，是社会改良、社会效益与社会卫生的工具。一项规划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一个图解，带着特定的社会目的将人与物以某种彼此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规划具有的形式提出了事物应该会怎样相互关联的假设，现代主义规划将标准的关联与分类固定在恰当位置，将其他可能性断然排除。更为松散、更为传统的城市那动态的、密集的机制被认为是混沌的、无法预测的、危险的。琳赛·布雷姆纳写的是约翰内斯堡的规划开端的故事，它与开国神话产生了全面共鸣。文中，在临时医院的分类栅栏中的，是作为控制和清洁工具的城市开始。纯净支持着但也困扰着社会，在社会清洁的终极实践中对景观进行分隔。连接性的网络作为价值与转换系统而被建立起来，控制着并高效地治理着地区之间的关系，使其成为行政和政策机器的一部分。不单是种族被分区了，歧视、恐惧与委屈的暴行也被隔开了。这曾经是，而且一直是经过规划的景观，储存着形形色色的紧张感与厌恶情绪。在一个受控制困扰的社会中，在政治层面上增强警卫已经造成爆炸性的、无法预测的后果。大家

的想法，或者是规划所服务的那部分人的想法已经习惯于恐惧，习惯于将真正的危险和想象的危险混在一起，习惯于在秩序与礼仪那孤零零的幻想之外树立围墙。现在，堡垒内部那超乎寻常的同质现象可以和更为开放的城市空间的相对违法现象形成对照了。这个有问题的、僵化的城市遗留物仍然是挂在可能的未来的脖颈上的沉重负担，社会秩序的调整仍然笼罩在令人不快的过去的阴影中。

经济全球化力量对城市的塑造有极大影响，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将许多城市从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全国中心转变为在全球经济的区域和网络中角逐更好位置的地方。或许，正是在这一全球化的对权力的竞逐游戏中才能更加清晰地领悟，在城市中过程比不变的物质更重要。在悉尼营销的故事中，佩内洛普·迪安讲述了政策与规划工作如何结合起来，完成在全球化时代提升城市的设计图景。该图景围绕着休闲这一主题而建立，必须比其他在全球范围中与悉尼竞争的城市的图景更有特色，更能够被识别。因为赌注如此之高，所以不仅是当地，所有的信息和媒体渠道力量也都变得适应全球化战略了。在悉尼，城市的中央地带本身具有的所有自然优势——同时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大城市居住环境——被营销了。公共政策支持投资，通过商务、贸易、高层建筑、昂贵住宅和娱乐业在城市中心的集聚来支持该战略。城市形象也成为住房的一个重要营销特性——房地产的变化依据是天际线和港口的景致，而不是其所处的位置和外部公共环境。因为在全球层面上急功近利，所以更低层面上的关系被忽略了，公共空间丧失了延续性，破碎为极其特殊的、充满想象的且毫无疑问排外的空间。

即使是最浮华、最新的城市，也不会从无到有地变得全球化。相反，城市的转型建立在对过去习惯和习俗的即兴创作和改写上。城市是由人建立起来的，那些最靠近金钱和权力流通的城市吸引了有活力、有创造力的人的注意。城市的形成与再造，贯穿着个人围绕着金钱与权力专注地对他们本人及城市进行定位和重新定位的过程。将高度当地化的状况与习俗进行改写，最后定位为与全球网络相关的城市，这在吉隆坡表现得格外明显。拉梅什·比斯瓦斯描述了这个熙熙攘攘的企业之地在东方的贸易路径的十字路口上，在全球资本流通中见机行事地将自己重新定位，同时以极度扩张的癫狂之态将利益最大化。这个地方从当地的文化模式中成长起来，社会关系与利益网本身成为支撑这一成功故事的结构。

一般人的生活似乎也是在同样乐观的、随心所欲的旋风中得到表现，因为城市将自己的全球化形象依附于一些壮观的、标志性的大众项目上。